

对于电影院、健身房、培训机构等经营场所密闭、服务对象聚集的行业来说,重开大门只是恢复市场信心的开始

等到与你重逢的那一刻



北京一家艺术培训机构的教师在上课。

本报记者 赵昂 摄

本报记者 苏墨 关晨迪 赵昂

一个多月前,北京葡萄树中法艺术教育创始人田萌,接到了相关部门的电话,通知她可以线下开课了,“我终于要和我的学生重逢了,那一刻,感觉所有的阴霾都一扫而空。”

对于电影院、健身房、培训机构等经营场所密闭、服务对象聚集的行业来说,重开大门只是一个开始,而市场信心的重建和客流的恢复,需要循序渐进。

挺过最难的时刻

今年27岁的杰森,在春天时曾给自己“做了最坏的打算”,就是要“休息一整年,靠存款过日子”,因为他是北京一家大型健身连锁机构的教练。今年年初疫情暴发后,他两

次收到健身房延迟复工的通知,一直到2月22日,他从老家回到北京的第3天,健身房宣布倒闭,杰森面临失业。

“很震惊。”收到公司的闭店通知,杰森一度不敢相信。同事们离开北京,杰森思虑再三,决定还是不要放弃健身教练这份职业,“我对这个行业有感情了。”

对于田萌来说,最难的时刻不是春天,而是暑假。这是因为,8月份接到的那个电话,并非她收到的第一份复工通知,最早的一通复工电话,其实是在6月中旬。但很快,新发地的疫情让第一份复工通知作废了。

这对于管理人员和教师的士气和信心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在疫情暴发之前,葡萄树在北京市西城区新建了校区,原计划暑期复课后新校区也投入运转。在此之前,他们及时调整战略,发布线上课程,维持正常教学运转,教师的基本工资和计时课费

都确保发放,社保待遇也继续维持。“当时,大家都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能结束。”

随着疫情好转,杰森接到了过去会员的咨询,想上课,但健身房都没了,去哪里上课呢?杰森想起一些他熟悉的健身工作室,是否可以支付场地费后租用他们的场地?杰森赶紧和工作室负责人联系,并得到了肯定答复。虽然曾经供职的健身房没有了,但这名教练依然带着他的学员。

“截至正式线下复课,几乎没有学生退课退费。”田萌说,“家长们依然对我们有信心,我们要对得起这份信任。”如今,她已经和自己的学生重逢。

相信好消息会到来

“得知武汉疫情的那一刻,我就跟股东们说,今年春节不分红了,留着资金过冬。”经营一家健身房的余先生告诉记者,“后来店面关了,有股东要撤资,说干脆解散分钱算了,多关门一天多损失一天,我告诉他,你相信我,我们一定能开门的。17年前的‘非典’,我在北京经历了停课和复课后的高考,所以,我有信心会等来好消息。”

从事电影业的肖副球,等到了好消息,但也等到了大挑战。7月16日国家电影局发布通知,低风险地区电影院可于7月20日有序恢复开放营业。而在这一通知发布的3天前,出品方宣布电影《第一次的离别》定档影院复工第一天,并发布“久别盼重逢”款海报。当时的估计是,还有10多天的时间准备。没想到,好消息会来得这么快。

肖副球从总发行人吴飞跃那里得知,电影的DCP母版和寄送给影院的拷贝还没开始做,发行通知和密钥都还没拿到、正式定档海报都没有找好设计师……但吴飞跃不打算放影迷们鸽子,接下来的84小时,他们要搞定一切。这个决定无疑有些疯狂,肖副球的手机不断在响,负责宣传的他,对接媒体,大家都想知道他们会不会履约。随后,肖副球

在朋友圈发出消息:统一回复,7月20日,《离别》会如约上映。

“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想把《离别》单纯地当作一部电影进行宣发,而是将它作为支持影院复工的事业在推动。最终这部电影如期上映产生的社会价值和影响力,我们是满意的。”肖副球说。

市场信心正在恢复

预付卡消费,尽管开门,但企业所用的资金,仍然是疫情暴发前消费者充值的。“开门只是个开始,许多消费者刚开始上门,只是想尽快花掉卡中剩余的金额。”余先生说,“其实接下来的几个月挑战最大,原本的租金减免没有了,如果想活下去,就必须有新的消费充值,消费者要相信,我们不会再关门了。”

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消费者的信心正在恢复。全国电影院复工首日,复工的影院为835家,在放映的总场次9991场中,《离别》以排名第一的27.1%排片率,放映了2700余场,效果不错。

而截至9月8日,全国有9849家电影院开业,影院复工率高达91%。在复工的头50天内,全国电影市场所有上映影片的票房总数为44.16亿元,8月25日七夕节为复工以来单日最高票房。在电影院里,热爱电影的人们再次重逢。

最近,随着西城校区投入运转,田萌每天接到的咨询电话,远远超过疫情之前。“现在回头来看,我们利用好了疫情期间的时间和契机,及时推出了线上课程,理顺了管理机制,并完善了整体课程体系,这对于未来的长远发展将大有益处。”在田萌看来,疫情的考验宛如一次洗牌,一些平时不重视教学教研、又不能及时线上转型的机构,显然会被淘汰。“大门重开,就是新一轮竞争的开始。”

看着游泳池里嬉闹的孩子们,余先生觉得之后的经营业绩也会蒸蒸日上,“还是那句话,我对未来有足够的信心。”



9月24日,小朋友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一家儿童平衡车俱乐部中学骑平衡车。

近年来,儿童平衡车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部分儿童群体中流行起来,孩子们在家长的陪伴下来到儿童平衡车俱乐部学骑平衡车,在锻炼身体的同时体验竞速带来的欢乐。

新华社记者 彭源 摄

G民声

社区体育设施配置要科学合理

舒年

最近,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的三名教授和暨南大学经济学院一名教授联合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他们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体育设施距离社区和单位越近,居民锻炼就越多吗?”

这个问题,也许很多人会毫不犹豫地回答,“那当然了”。但根据这四名教授在广州市的6个内城区12个典型街区的调查来看,这个题目的答案应该是,“还真未必”。

根据这份调查结果,首先,居民体力活动时间与其可自由支配时间正相关,换言之,如果经常加班没有多少自由支配时间,自然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去强身健体,工作场所和社区布局再多体育设施都无济于事。

另外,社区周边体育设施的数量与居民体育活动时间有关,但与距离的关系不明显,比如,游泳馆距离社区的远近,是和居民体育活动时间有关的,因为去游泳馆往往是单独行为,洗完澡谁也不愿意走远,但团体性体育设施距离社区远近,对居民体力活动影响不大,因为足球场、篮球场往往是社交场所,本来就要相互邀约,无所谓远近之分。而工作地点周边体育设施的数量对居民体力活动影响不大,因为居民是在工作日才前往写字楼等场所,活动意愿不强,但距离则有所关系,因为工作之余可支配时间有限。也就是说,居民在不同功能区域,对于不同的体育运动设施,需求是截然不同的。

还有一点不容忽视,这也是许多城市存在的通病,调查发现,广州老旧城区分布体育设施较多,但因为居民经济条件有限,反而体力活动意愿不高。而新城区居民有很强的体力活动意愿,无奈体育设施分布较少。调查的结论是,“居民体力活动时长与体育设施可达性之间的关系会因受访者的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和收入状况差异而有所不同”。

事实上,不少城市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从数值上看人均体育健身用地不少,但在实际操作中,新建的运动场所和设施出现闲置,但小区居民又抱怨找不到合适的健身之所,甚至不同项目的锻炼群体还因为用地发生矛盾。这就需要规划者思考,是不是供求出现错位?

体育设施的科学合理布局,最终是为了促使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的居民都能参与到全民健身中来,如果不同人群在不同场合的体力活动需求大为不同,那么,体育设施特别是公共设施的分布,也不能搞“一刀切”,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老龄化社区与年轻化社区,需要的体育设施肯定不一样,写字楼的文员与工厂的工人,喜欢的体育运动和参与形式也可能不一样,不同收入的群体,能够接受的体育健身消费场所也不一样,需要科学合理地精准配置社区体育设施,从设施内容、距离到定价区间。

中山大学和暨南大学的研究很有前瞻意义,其他城市不妨也对本地体育设施分布和居民体力活动意愿做做调查,把体育运动设施布局得更加科学合理,更好地激发群众体育锻炼意愿。

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累计完成营造林902.9万公顷

据新华社电(记者王菲菲)记者从24日在山西省右玉县召开的全国防治风沙暨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经验交流现场会上了解到,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实施20年来,累计完成营造林902.9万公顷,工程固沙5.1万公顷,草地治理979.7万公顷,工程区森林覆盖率由10.59%提高到18.67%,综合植被盖度由39.8%提高到45.5%,区域沙化土地面积年均减少432平方公里。

同时,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始终把改善生态与改善民生相结合。根据对工程区25个样本县连续监测,林业总产值从2000年的6.49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40.19亿元,工程区内的28个国家级贫困县于2019年全部摘帽脱贫。



中秋节将至,又到赏月时。天文专家表示,今年中秋月“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最圆时刻出现在10月2日(农历八月十六)凌晨5时5分。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易地扶贫点的新生活

“住房有保障,增收有门路。”在甘肃宕昌县甘江头乡谢家坝村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新搬迁进来的村民这样描述现在的生活。

2019年,甘江头村、张家山村等9个村的208户839名贫困群众,搬进了这个易地扶贫安置点。为解决安置点搬迁群众后续产业发展和稳定增收问题,当地通过鼓励外出务工、龙头企业及村办合作社就近务工、确定公益性岗位、产业到户资金入股分红、政策兜底等多种措施,确保每户搬迁群众都有增收门路,真正实现搬得出、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贵州遵义有对“辣”夫“椒”妻

本报记者 李丰 通讯员 罗星汉

9月17日,在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新蒲新区虾子镇的一块辣椒试验地里,一男一女戴着毡帽正在为辣椒实施人工授粉,烈日当头,汗水像雨水一般从他们的脸颊流下来,再滴落在土里,两人看上去与当地农民并无二致。

事实上,他们是贵州辣椒界小有名气的这对夫妇,男的叫余常水,今年58岁,贵州省辣椒方面省级创新团队领衔人,女的叫令狐昌英,今年54岁,夫妻俩都是遵义农业科学研究院辣椒所的正高级专业技术人才,专注辣椒科研事业已有27个年头。

无经费的“兴趣小组”

余常水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水稻研究,1991年底被抽调到遵义大颗粒肥料厂做研究,之后每次出差,他都会行李箱里放一罐遵义辣椒。“我在外地就餐时,习惯性地要一碟当地辣椒,再拿出遵义辣椒,对比着吃。”余常水回忆说,“这种对比让我发现,遵义辣椒特色鲜明,既香辣又可口。从那时起,我

有了想法,要将遵义辣椒研究好,推广到全国甚至国外去。”

有了想法就要付诸行动。1993年,余常水自费启动了辣椒研究项目,成立了一个“辣椒兴趣小组”,这个小组共3人,余常水夫妇与他们的一个同学。小组定了一个目标:致力于遵义朝天椒的品种选育研究,保持朝天椒的品质、增加产量、提高抗性、扩大适应性,让市场认可,让种植农户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由于本职工作是研究水稻而不是研究辣椒,加上辣椒在当时完全就是农民自种自食,市场前景并不看好,单位领导和同事并不支持这个“兴趣小组”。但苦于余常水固执的脾气,单位“约法三章”:一是不能占工作时间,研究辣椒只能用周末和节假日;二是没有科研经费,只能自己掏腰包;三是土地自己想办法解决。

就这样,这个“辣椒兴趣小组”就开始工作了。没有经费,就用工资节余;请不起工人,就自己动手干;没有土地,余常水找父亲要了两亩耕地作为试验地。过了一段时间,小组就只剩下夫妻两人。“那时候很艰难,从辣椒资源收集、整理、栽种、授粉、杂交、鉴定再到采收,每一个环节都是我们自己干。由

于交通不便,我经常搭乘运煤车或拖拉机去农户地里收材料,路上危险得很。”

“游击队”变“正规军”

在余常水夫妇的努力下,转机慢慢出现。1996年,“老干妈”入驻原遵义县,对干辣椒的需求量特别大,老百姓种植辣椒不再是仅供自给自足,还可以变卖增收。

1998年,当地老百姓对余常水夫妇研究出来的朝天椒种子越来越认可,登门求购种子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研究的信心更足了。2003年,原遵义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成立了遵义市辣椒课题组,任命余常水任组长,并首次获得了20万元科研经费,辣椒研究“夫妻档”正式从“游击队”变成了“正规军”。

“名分”有了,经费有了,人手也有了。20多年来,余常水夫妇选育审定了遵辣1号至10号系列品种。“每审定一个新品种,都是对前一个品种的优化升级,都会收获一份喜悦,同时也是一个新的开始。”令狐昌英对近年来的成果如数家珍,“2012年,‘遵辣1号’成为全市换代工程指定的唯一品种,也成为贵州省辣椒区试对照品种之一。‘遵辣6号’连续两年在贵州省区试中综合评价排名领